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

兹根据 1995 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 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 年版。以下简称《灾情报告》）所记载的材料逐年作一介绍：

1959 年

1959 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 4463 万公顷（每公顷等于 1 万平方米，合 15 市亩，计 6.8650 亿亩），成灾（收成减产 80%以上为成灾）面积 1373 万公顷（《灾情报告》第 378 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 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 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 1—4 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 300 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 4—5 寸深，为历史罕见。4—5 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 50 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 2—6 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 200 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 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6—8 月出现江淮流域的大旱灾，到 7 月下旬受灾面积达 82.2 万公顷，持续到 8 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 2276 万公顷。7 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 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7—9 月，东南沿海遭到 5 次台风侵袭，最高达 12 级，使 120 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 8043 万，超过 1949—1958 年平均数 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 1000 万。本年春荒人口达 9770 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 1949—1958 年各年平均值的 2.87 倍。

1960 年

1960 年，继 1959 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 6546 万公顷，成灾面积 2498 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 35 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 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 300—400 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 2319.1 万公顷，成灾 1420 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产粮区合计受灾 1598.6 万公顷，成灾 808.5 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 68.9%和 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 800 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

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 38.46 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 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 个月里台风登陆 11 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 10—20 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 379 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 11 省受灾 993.3 万公顷，直接死亡 5000 余人。山东部分地区 30 多天里降暴雨 19 次，平地积水 3—4 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 143.7 万公顷，“鞍山、木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 378、379 页）。

本年 3—5、9 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 21 省区，受灾面积 138.1 万公顷。3—9 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 21 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 392.26 万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 1959 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地区人口达 9230 万人，春荒人口高达 12980 万，相当于 1949—1958 年各年平均值的 3.8 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 年

1961 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 6175 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 2883 万公顷，为 1954 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 35 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 80% 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 16300 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 21800 万，相当于 1949—1958 年各年平均值的 6.4 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 3 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 1300 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 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 3784.6 万公顷，成灾面积 1865.4 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低水平又减产 50%，湖北有 67 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 504 万间。4—6 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 10 个县市城……7—8 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 160 万公顷，占播种面积 54%，近 100 万公顷无收成。

到 9 月，灾区有 60 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 3500 个村庄被水包围，280 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 4.9%，7 月下旬至 8 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工。松花江流域 7 万公顷绝收。

8—10 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台风袭击 11 次，其中 12 级以上占 9 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 82 页）。淹没 180 万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高于任何一个时期。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全国受灾最严重的有10个省：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前三名是山东、河南、安徽。“（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50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上最严重的时期。这三年受灾面积大大高于建国50余年来任何一个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灾，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第6页）。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实在调苦了，农民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

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人，不承认1959、1960、1961年出现的经济困难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有关。《中国经济日报》1998年2月27日报导：《三年大饥荒源于大食堂》。龚启圣在《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一文中将近来西方学者（包括旅美中国学者）的结论归纳为三种：1、“过量的粮食征购”；2、公社化、退出权和生产滑坡；3、公共食堂和非理性消费。对所有这些，笔者用一句话来回答——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

关于“苏修”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和逼还债务问题

1959年6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签订的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他们的借口是“中国生产核武器会和其他国家生产核武器一样给西方以借口”。这里人们看到，赫鲁晓夫以牺牲中国向帝国主义妥协。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后，苏共修正主义集团把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对中国施加压力。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片面撕毁了专家合同和补充书343个，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共计600个合同。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00余人，并终止派遣专家900人。虽然中国政府多次挽留，苏联一方却始终坚持。苏联专家撤退时，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

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以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背信弃义，使我国 250 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与此同时，1960 年 7 月，赫鲁晓夫摧逼中国政府还债。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曾给予中国政府一些贷款。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向苏联购买的武器，也以贷款形式记账，共记人民币 58 亿余元。其中大量贷款是购买武器的费用。赫鲁晓夫妄图以此卑鄙手段压垮中国共产党。当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时，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传》第 1547—第 1548 页）。

赫鲁晓夫逼债，对中国的经济困难，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宁可勒紧腰袋，忍饥受寒，也要还清债务。当时中国工业处在起步阶段，出口主要产品是农副产品，在本来就处于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形下，1959 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额，征购 674 亿公斤，出口 41.6 亿公斤。1960 年征购 510.5 亿公斤，出口 26.5 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 1958 年相等。1961 年，粮食开始调入和进口。（《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393、第 422 页））。

赫鲁晓夫的压迫，使中国工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陷于严重危机。资金短缺，靠从农业中挖潜力获取支援。广大科技人员挺身而出，一代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靠党的领导，靠人民的支持，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苏修集团的压迫，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奋发图强。

关于“左”倾错误的贻害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主要是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大跃进中的浮夸风，使国家对粮食产量的估算和统计失实、失真，因而发生了征过头粮的错误。

1958 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 1958 年粮食产量将达到 3000—3500 亿公斤，比 1957 年增产 60—90%。1958 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 4250 亿公斤（1958 年 12 月 7 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吉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 650 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 105—第 10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1959 年 8 月 16 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 1958 年的农业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 2500 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 1958 年全国粮食产量低于公布数字，只有 2000 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 年 10 月 12 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一年能吃大约 500 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

人民每人平均可有 275 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这种错误判断，埋下了征过头粮，使农民挨饿，甚至发生饿死人的祸根。

其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共产风”，把农民的生活资料和少量的个体生产资料，一律归公，农民的个体储备一扫而空。同时穷队、富队拉平，出现了一部分人剥夺一部分人的情形，平均主义导致了大家都穷。另外，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因素的公共食堂，造成了粮食大量浪费和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据国家统计局 1960 年 1 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先后办起了 39.9 万个公共食堂，参加吃饭的人口有 4 亿，占人民公社总人口的 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 7 省市区达 90% 以上。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有的食堂三个月吃掉一年的口粮。常年农民一家一灶个体吃饭，瓜菜代、低标准，老、少、年平均 200 斤粮。吃公共食堂不到 3 个月便把一年的口粮吃掉了。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 1958 年 9 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饭”；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两个月即 1959 年 1 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饿：到 5 月已有 55 个村 255 个食堂停炊。“共产风”把农民掏空了，吃光了！农民抵御灾害的能力降为零。

于是才有了几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发生。

作者：黎津平